



周末示威宣告“游戏结束”

■ 本报评论员:余凡

自7月21日起,在社交媒体上就大肆流传鼓动民众于24日周六聚众上街示威的号召,宣传页面上方以白字书写“号召全民行动”,中间红色大字“XX游戏结束”(End Game),以拒绝延长“限制令”(PPKM)为借口,在白方格内写道“粉碎寡头政权及其追随者”,计划由草埔(Glodok)沿大路步行到总统府集会请愿,但没有注明召集人或负责单位。

《印尼CNBC网》于24日报道,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雅加达的数条主要通道被封闭,可以看到独立广场(Medan Merdeka)西路及北路已经摆放障碍物(barrier),而铁刺网也已堆置一旁备用。雅加达警方已于早上7时集合3385名混合的军警及

治安人员,随时准备维护社会安全。行动科长(Karo Ops)马苏迪安多(Marsudianto)透露,治安人员大多被布置在摩纳斯(Monas)纪念碑及国会大厦附近,在几处主要路口及路段有监控点。

雅加达首都特区副省长利扎(Ahmad Riza Patria)于23日晚间在市政厅发表谈话,劝导民众别游行集会,担心新冠肺炎有可能加速传播。他不愿看到出于善意,希望政府修正限制令(PPKM)的请愿活动,反而造成新的问题。他也呼吁民众遵循政府的防疫规划,在限制令期间减少外出。“政府出台限制令完全是为了确保民众的健康和安全而着想。”

《共和网》(REPUBLIKA.CO)于24日引述国家警察(Polri)公关厅长尤沃诺(Argo Yuwono)督察的话,当天网络流传叙述“周六同时

发动的游行造成了暴乱”的视频是谣言,场景其实是去年10月8日,在雅加达因抗议《就业法案》(Omnibuslaw)演变的暴力冲突。显然,有幕后团伙希望在民间制造恐慌和愤怒,让他们能在挑起的示威和暴乱中浑水摸鱼。

尤沃诺呼吁社会民众不要轻信不负责任团伙所散布的“假消息”,对于尚未证实的信息,不要任意转发分享。他肯定地表示,雅加达及各大城市都没有示威游行,“局势平静、可控,完全没有可担心的骚动。”警方已对“反政府”视频打上“谣言”警示后发布。

雅加达警察厅(Polda Metro Jaya)公关科长尤斯里(Yusri Yunus)对“XX游戏结束”宣传示威的动向发表看法,“至今尚无任何动静,很多谣言在散播着,所以警方仍然预测维持社会

的治安情况。”虽然游行队伍没有出现,但警方继续保持对突发状况的戒备。之前,他也已提醒民众,在限制令期间不要违规集会,担心新冠疫情趁机在群众间传播感染。

《印尼CNN网》24日称,雅加达警察厅行动科长马苏迪安多警官宣称,警方在阿如纳奔马雕像(Patung Kuda)盘问了一批形迹可疑的青年,他们直接被带往在摩纳斯广场待命的警车,因青年们并无违法的言行,没有采取扣押行动,但警方将保持警惕。雅加交警科长山勃多(Sambodo Purnomo)表明,在部分道路设障是为了应对当天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而关闭摩纳斯附近的道路是情境性的,将视现场状况的升级与否随时作出调整。

著名政论员德尼(Denny Siregar)在其推特账号上

连续贴文:“请注意,有以人民因限制令受苦而发动示威的计划,游行将有对党、激进团体及无政府(Anarko)分子渗透作乱,他们的目标是总统退位。”“高喊总统下台的是情民,不是人民,“他们的目的就是引发暴乱,在万隆有游行携带燃烧瓶而被捕。”“事实表明,若有穿OJOL制服的示威者,那是伺机制造暴乱的幕后挑衅者。”“他们准备牺牲参与游行的民众,然后向警方泼脏水。”他的言论得到网民的普遍支持,却也引来了一些政客的质疑、指责和谩骂!

《美都电视》(MetroTV)报道,警方在摩纳斯广场扣押10名携带可疑物品的少年,他们显然是被“24日大游行”的消息所引来,竟把自己的青春和前途,往那些毫无根据、蛊惑煽动的“谣言”押上了。200

年前,法国作家伏尔泰(Voltaire)说过:“谁有本事让你相信荒谬言论,谁就能令你犯下暴行(Those who can make you believe absurdities can make you commit atrocities)”仿佛就像描绘国内一些“愚民”的现状!

哲者说:“言论自由不包括置人于死地的自由。”那些造谣者蛊惑愚民上街集会,如果其中有人感染新冠病毒甚至不幸丧命的话,这个“道德责任”应该由谁来背?那些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假新闻、仇恨言论、造谣谎言的人肯定有罪,绝不能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

炒作得热火朝天的“周末示威”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下宣告“游戏结束”,全国百姓在额手称庆之余,也对治安单位的坚决执法大加赞赏,祈愿国家面对的困境能早日解决。

■ 江春

无论怎样也想不到,以陈东这样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竟然一跌不起,说走就走了。而且走得如此突兀,如此急速,又如此无奈,只留下无尽的震惊、伤痛与无尽的疑惑与遗憾。

同窗六年(至1968年离校),我与陈东可算是走得比较近的可以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了。因为都喜欢写写画画,我俩都曾是学院“美术工厂”的成员。办班级墙报、板报,他插图,我写标题,一直是搭档,志同道合,相得益彰。

毕业后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们常有联系。先是书信往来不断,后来电脑普及,于是就e-mail互通音息。他常给我转发许多重磅内参资料,令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即使是涉及一些敏感话题,我们之间也可以倾心交流,毫无顾忌。我还曾路过镇江时到他家

忆陈东

中小住,他极尽地主之谊,陪我在镇江弯曲的街巷遍尝小吃。

2008年秋,中四(1)班同学扬州聚会,我们同住一室。多年不见,相逢甚欢,彻夜长谈,几乎无眠。临走,他还执意把我的住宿费给结了,怎么交涉都没用。他还多次邀我再去镇江小聚,看看他的新居和收藏……可惜,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这一生涉猎甚广,著述颇丰,逻辑学、民间文学、语法修辞、教学法、心理学,仅寄我的书就有五六年七八本之多。他甚至还写起了小说,给我寄过他计划中的《陈东文集》目录,煌煌有十多卷,多数已正式出版,未出版的也有详尽提纲,令我大开眼界,自叹勿如。我曾担心他自费出版

耗费甚巨,他雄心不已,信心满满地说:“不急,等出版社来找我也不迟。”他亲自为他父亲编纂了五卷本的“文集”,并付诸出版发行,其付出精力之浩繁巨大可想而知。

他还有许多社会交际、公益服务之类“份外”差使,是我班乃至我年级少有的“热心人”。微信初起,他是最早尝试使用的一个,自行创立了“钟斯益”这个班级微信群,陆续把我等同学一一拉入群内,构成了一个和谐亲近的交流平台。其辛苦、操劳、麻烦难以尽知,但他始终甘之如饴,乐此不倦。为了出版班级的纪念文集《同学的思念》,他多方奔走,积极组织、策划、征稿、编纂……出力甚多……

他的学生曾为他写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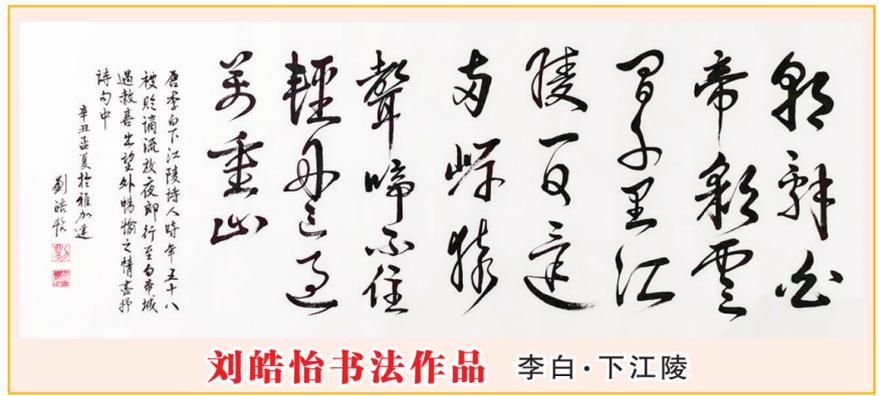
一篇长文,介绍他在教育、创作、学业、拳艺、公益诸方面的杰出事迹,嘱我联系印尼的《国际日报》予以刊载,后报纸刊登了,我也转发给了他,但报纸原件因为海外邮寄不便,只能等待来时。可惜陈东再也看不到登载自己事迹的报纸原件了……

陈东与我均为极好运动之人,在扬师时,课余常在教室前空地托垫排球。

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一直坚持打拳习武,还与日本来的高僧切磋拳艺,颇有心得造诣。而我工作后,也一直运动不断,打过排球、羽毛球,后来打网球二三十年,曾计划起码打到八十岁。后因体检出了点小“毛病”,被老伴强行禁打,现在只好散步、爬山、打“八段锦”了。风闻陈东是在阳台习练时摔倒昏迷,虽经多日抢救治疗,仍无力回天,

酿成悲剧。此番遭难,源自运动,因耶,果耶?过耶,祸耶?难以澄清,亦为我辈敲一警钟耳!

六年前,我曾书赠陈东一首诗《观陈东赤身习武有感》,诗曰:“赤身雪地如来功,闪转腾挪势如虹。思源不竭连本出,嵩岳顶上一青松。”而今,“青松”突然凋折,让人不胜欷歔嗟叹,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刘皓怡书法作品 李白·下江陵



德固·卡利亚

德固·卡利亚(Teguh Karya)不仅是一位剧作家,同时也是印尼举足轻重的戏剧和电影导演。他培养了许多电影导演、演员和艺人。其中,多人曾赢得印尼的各大奖项,而德固自己执导的电影也斩获了多项国内外大奖。

1935年9月22日,德固出生于万丹省板底兰县(Pandeglang)的一个土生华人家庭。其原名为史蒂夫·林全福(Steve Liem Tjoan Hok)或史蒂夫·林(Steve Liem)。自苏哈托上台后,林全福将其原名更改为现在使用的印尼语名。林父是一位小商贩,在五个孩子中,德固排行老大。

1956年,德固在日惹电影与戏剧艺术学院(Akademi Seni Drama dan Film)学习。1957年至1961年间,他来到雅加达印尼国家戏剧学院(Akademi Teater Nasional Indonesia)继续攻读表演、设计和导演专业。1957年,他与土生华人基督徒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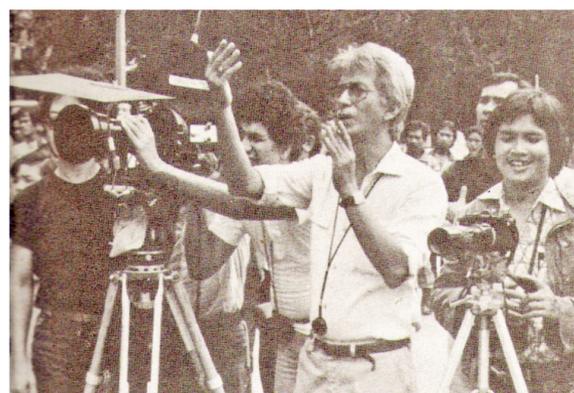
德固·卡利亚(林全福):鞠躬尽瘁,毕生奉献

■ 廖建裕(Leo Suryadinata)

雅加达成立了基督教戏剧团(Seni Teater Kristen)。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德固成为一名舞台演员,同时也当上了青年导演。1958年,德固在新明会(Sin Ming Hui)周年庆典期间,导演了曹禺(Cao Yu)的经典作品——《雷雨》。该剧讲述了一个华人家庭的悲剧故事。可以看出,成立于雅加达的土生华人社团新明会曾赞助了多项戏剧和体育活动。

成名前,德固以演员或艺术指导的身份,参与了至少四部电影的制作,如:《智多星将军》(Djendral Kantjil)(1958)、《媒婆》(Mak Tjomblang)(1960)。1961年,德固成为电影《铁丝网》(Pagar Kawat Berduri)的导演助理。这部电影的主题围绕印尼革命展开。

1963年,德固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as Hawaii)的奖学金,得以赴美学习戏剧与电影制作。然而,他在学业完成前便返回了印尼。1965年,他创立了以印尼大酒店(Hotel Indonesia)为大本营的大众剧场(Teater Populer)。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Taman Ismail Marzuki)建成后,德固便把剧场从印尼大酒店搬了过来。1975年,德固建立了表演学校(Sekolah



德固·卡利亚在拍片现场

Seni Peran)。受益于大众剧场和表演学校,德固培养了不少知名的电影人物。其中有:史拉默·拉哈佐(Slamet Rahardjo)(导演)、亨基·苏莱曼(Henky Sulaiman)(导演)、乔治·卡玛鲁拉(George Kamarullah)(电影剪辑师)、都蒂·英德拉·玛拉安(Tuty Indra Malaan)(女演员)。

德固的处女作是电影《一张男人脸》(Wajah Seorang Lelaki)(1972)。这部电影不仅由他亲自执导,故事手稿和剧本也由其亲自创作。选角上,德固启用了大众剧场的演员。然而,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并不理想。德固还因此被称为“票房毒药”。坊间戏言道:若想拍摄电影并已做好

血本无归的准备,那么可以请德固来执导。然而,德固没有灰心丧气。他从处女作的失败中发现了不足,汲取了经验。

随后,德固执导了电影《初恋》(Cinta Pertama)(1973),从此声名大振。在1973年的印尼电影节(FFI)上,德固荣获“形象杯”(Piala Citra)“最佳导演奖”。当时的电影主演克莉丝汀·哈金(Christine Hakim)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演员,然而,凭借这部电影,她夺得了“最佳女演员奖”。此后,德固执导了一系列电影,并获奖无数,如:《新娘的床》(Ranjang Pengantin)(1974)、《私奔》(Kawin Lari)(1974)、《同一个季节里的婚姻》(Perkawinan

dalam Semusim)(1976)以及《云开见月明》(Badai Pasti Berlalu)(1977)。其中,电影《新娘的床》让德固在1974年的印尼国际电影节上再夺“最佳导演奖”的桂冠。

电影《1828年11月》(1978)以印尼历史为题材,讲述了帝博尼哥罗(Diponegoro)起义事件(1825-1830)。帝博尼哥罗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爪哇王子,他拒绝向荷兰殖民政府屈服,并发动了武装起义。然而,起义最终以失败结尾。杨汉祥(Njoo Han Siang)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兼制片人。在1979年的印尼电影节上,该片包揽了“形象杯”六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奖”以及“最佳导演奖”。20世纪80年代,德固继续执导了多部电影,并凭借以下三部电影分别获得三次“最佳导演奖”:《蚊帐背后》(Di Balik Kelambu)(1982)、《母亲》(Ibunda)(1986)以及《误车的爱人》(Pacar Ketinggalan Kereta)(1989)。

电影《母亲》一举夺得“形象杯”十三项大奖中的六项。《雅加达邮报》如此评论道:“作为印尼公认的知名导演,在德固声名远扬的职业生涯里,他早已经赢遍‘形象杯’的全部奖项,

但却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信服。”(The Jakarta Post, 5 Agustus 1986)

德固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20世纪80年代,香港第七届亚洲电影节展映了九部德固执导的电影,其中一部是《蚊帐背后》。在电影评论家看来,德固的电影所具备的主要特点在于着重表现印尼民族生活中的家庭奋斗史。参加电影节的观众纷纷表示,这部电影蕴含了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

有消息称,对于1998年5月13日发生的排华暴力事件和针对印尼华裔的烧杀奸掠行为,德固深感震惊和失望。他突发严重中风,瘫痪在床。三年后,即2001年12月11日,在雅加达逝世。

德固终生未婚。在2001年的亚太电影节(Festival Film Asia Pasifik)上,因德固对印尼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被授予“终身成就奖”。2002年10月10日,即印尼的“国家英雄日”,为表彰对印尼文化事业发展有卓越贡献的印尼儿女,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追授给德固文化领域的最高勋章——“帕拉玛·达尔玛文化之星”(Bintang Budaya Parama Dharma)。同时,诗人凯尔·安瓦(Chairil Anwar)和作曲家伊斯迈·玛祖基(Ismail Marzuki)也获此殊荣。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